

《田氏一家言》的文学批评方法及特色

李 锋

内容提要：《田氏一家言》中的批评主体，主要由土家、汉两族批评家组成。他们分别采取“选本”“论诗诗”和“评点”三种经典的批评方法，对土家族田氏诗人的作品进行了批评实践。批评家运用这些批评方法，既站在各自的角度表达观点、展现特征，又相互补充，达成诸多共识，共同构建了《田氏一家言》的理论体系。同时他们对少数民族文学价值的认识和肯定，以及主张“真”“雅”诗风等理论和观点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关键词：《田氏一家言》 批评方法 批评特色

《田氏一家言》(下文简称“《一家言》”),是康熙时期容美土司田舜年编辑的本族诗人作品合集。至雍正朝,容美土司制随着末代土司田旻如的“投缳自尽”成为历史,该书的传承自此失去保障,历两百年兴衰,至民国时期已“残缺无几”^①。但仅就今天的残本来看,其规模仍相当可观,录有土家族诗人田九龄、田宗文、田玄、田甘霖等的诗集及少量田氏诗人与汉族士大夫的散篇诗作,共计诗词作品 528 首(诗 521 首,词 7 首),其中土家族诗人作品 517 首,汉族士大夫的倡和之作 11 首^②,另有 81 首佚诗存目。可以说,该书代表了容美田氏,乃至整个土家族古代文学的较高成就。此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辑有土家族和汉族批评家的诗集序跋 10 篇、诗评 111 条,加上诗集当中含有文学批评思想和理论的作品,形成了一个批评主客体多元化、批评文体方法多样化的较为系统、全面的文学批评体系,因此《一家言》的

^① 张西园在民国十九年所作《田氏世家》“附记”有言:“田氏先代之书,如一家言诗集,既付残缺无几,而舜年所作之《白鹿堂诗集》,与《世述录》《廿一史纂》《许田射猎传奇》等书,更多湮灭殆尽”。转引自中共鹤峰县统战部等编《容美土司史料汇编》,内部资料,1984 年,第 103 页。

^② 关于《一家言》存世的具体篇目数,《〈田氏一家言〉诗评注》统计为存诗 507 首,文 17 篇,评语 107 条,序文 6 篇。而据笔者统计,《〈田氏一家言〉诗评注》本身所收诗作就有 518 首(田氏诗人诗作 515 首,汉族诗人诗作 3 首)。较之《容美土司史料汇编》所辑《一家言》集,《〈田氏一家言〉诗评注》未收田玄《立春日忽雪》(残诗)等 10 首作品,多收田舜年《和羽伯复得虎韵》等 3 首作品,将两部著作中的诗作合并去重,共得 528 首。文中所引《田氏一家言》“序跋诗评”,除特殊注明外,均出自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仅在诗文后标注篇名,不再另注。

诞生,亦标志着土家族古代文学批评的高峰。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一家言》的研究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文献的整理和注释,代表成果有中共鹤峰县统战部《容美土司史料汇编》中所收《田氏一家言》(简称“汇编本”)、陈湘锋《〈田氏一家言〉诗评注》(简称“评注本”)、祝注先《历代土家族文人诗选》^①(简称“《诗选》”)。其中“汇编本”为较早版本,“评注本”以“汇编本”为底本,以五峰县长乐坪田培林所藏抄本为校本,并对诗作进行了注释和简评,《诗选》则选取了田九龄等人的代表性作品,进行了注释和简说。二是专题性研究。这一部分又可分为四类:文艺美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和文论研究。其中,文论研究部分,祝注先《清初土家族诗人田舜年的诗作与诗论》^②一文,讨论田舜年“反对因袭、主张独抒性灵”的诗学思想,开启了有关《一家言》文论的研究。此后,买买提·祖农《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③也对田舜年的《〈田氏一家言〉跋》进行了注释并有简评。《〈田氏一家言〉诗评注》对《一家言》的序跋进行了注释,并对诗作的分析引用了少量严首升的评点^④。另外,王佑夫《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⑤等对《一家言》的文论亦有涉猎。但整体上看,这些论著主要讨论了田舜年的诗学思想,对其他批评家,尤其是汉族批评家的诗学思想很少关注,而对相关文学批评方法的研究,更付之阙如。实际上,《一家言》中的文学批评方法及其特色,不仅在少数民族古代文学批评中有代表性,而且对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亦有参考价值。《一家言》的批评主体,由土家、汉两族批评家组成,他们分别采取“选本”、“论诗诗”和“评点”三种经典批评方法,对田氏诗人的作品及其相关涉的作品、理论进行了批评实践,并体现出一定的特色,尤其是对少数民族诗人、诗作价值的分析和肯定方面,颇有创见。

土家族批评家的批评方法及特色

《一家言》中,土家族田氏批评家主要采用了“选本”批评和“论诗诗”批评两种方法,并在运用这些方法的批评中,展现了理论特色。

(一)遴选作品和“序跋”批评:土家族批评家“选本”批评方法的两个方面。

“选本”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起源最早、最重要、最常见的批评方法。《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⑥这是关于孔子“删诗”的最

① 彭勃等辑录,祝注先选注《历代土家族文人诗选》,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

② 祝注先:《清初土家族诗人田舜年的诗作与诗论》,《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③ 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1-265页。

④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第430-446页。

⑤ 王佑夫主编《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6、30、151页。

⑥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6页。

早记录,也是有关“选本”的最早理论表述。“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表明其已经具备了“选本”批评的最基本要素,一是有相对固定的批评标准;二是根据这个标准对作品进行遴选。“删诗”或非孔子所为,但“三百篇”之成形,却定是“选本”批评的结果。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选本”批评走向成熟且较为流行,如挚虞《文章流别集》就是经典选本,该集选录颂、赋、诗、箴等十余种文体的作品,并“采摭孔翠,芟剪繁芜”^①。再如《文选》,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②的原则,选录了 38 类文体的代表性作品。唐代,单一文体(诗体)的“选本”又发达起来,诗集多达 137 种之多^③,且都蕴含着文学批评的意义,如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云:“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耸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自郢以下,非所敢隶焉。”^④明确提出收录的标准,即“风雅”“清新”,具有艺术感染力,并对平庸之作(“自郢以下”)一律不取。可见,“选本”批评流传有序、特征清晰,是经典的批评方法之一。

《一家言》中的土家族批评家也采用了“选本”批评的方法,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对作品进行编选;二是在序跋中进行理论申述和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

就第一方面而言,主要实施者是田楚产、田舜年,其特色表现在:强调诗集对弘扬家族文学传统的意义;坚持遴选标准,不求多而为务;将诗人品德作为编选诗集的重要标准。田楚产特别提出编选田宗文的诗集,是希望“后世小子”能够“嗣是见贤思齐,淘洗一切,勉步学芳躅”(《〈楚骚馆诗集〉跋》)。可见,将田宗文树立为家族文学传统中的标志性人物,并号召族中后辈向其学习、延续传统,是田楚产编选诗集的重要动因,这一“选本”批评思想带有鲜明的家族特色,与大部分的“选本”理论迥然不同。此外,田舜年在编选诗集过程中,并未像大多数编选者那样遵循“多多益善”的宗旨,而是依据自己的审美旨趣和批评倾向进行遴选,亦是特色之一。如编选田九龄诗作时,对于七言近体与绝句,田舜年就曾“汰其太染时调者”(《〈紫芝亭诗集〉小叙》)。考虑到田九龄是其高祖辈,敢于这样做“减法”并明确说明原因,需要的不仅是批评的眼光,还有公正和勇气。在编选过程中,非常强调诗人的品德并以此为重要标准之一,也是田氏“选本”批评的特色,如谈到田氏诗人辈出,“兹姑未暇多取,而独及珠涛者,以其忠且才……故藉其诗以传之云尔”(《〈田珠涛诗〉小引》),明确提出编选田商霖(字珠涛)诗集,除了因其“才”之外,更因其之“忠”,并希望通过诗集褒扬其“忠”“实”的品德。田楚产也赞扬田宗文品性高洁,并希望其高洁的品性可以借由诗集影响族中后辈,所谓“如蝉蜕污泥,自致尘垢之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异地异世,尚有遐思,而况亲炙一堂者哉”(《〈楚骚馆诗集〉

① 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1089 页。

②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 页。

③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291 页。

④ 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456 页。

跋》)。

就第二方面而言,以田舜年为“主将”。从保留下来的序跋看,他所写共有4篇,都颇具特色。主要表现在:

首先,使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式。其特色表现在能抓住关键、切中肯綮。由于批评对象都是族中长辈,田舜年对于这些人的生平及性格特征,较之汉族批评家更为熟悉,因此在批评中更易抓住其生平、性格中的关键点来分析、总结其诗作特征。介绍田圭“喜宾客而耽文雅,诗酒娱情,至老不倦”,并认为“盖其性平易嬉游,诗亦似之,唯取适性,不甚矜琢也”(《〈田信夫诗集〉小引》)。指出田圭的诗作与其性格相似,有平易自然的特色,但同时也因个性影响,使其诗有平直粗糙之病,缺乏蕴藉之美和体律之工。

其次,兼顾“自然抒发”和“风雅兴寄”的批评主张。田舜年的“自然抒发”,其特色在于有三层含义:一是强调诗歌应是情感的自然抒发,所谓“诗言志也,各言其所言而已……十五国风,大都井里士女信口赠贻之物”(《〈田氏一家言〉跋》);二是反对刻意模仿,“果若人言,绳趋尺步,诗必太历以上,则自有盛唐诸名家在,后起者又何必寻声逐响于千秋之上哉”(《〈田氏一家言〉跋》);三是提出自然抒发的作品有天然之美、自成佳作,“天机所动,将亦有自然之律吕焉”(《〈田氏一家言〉跋》)。同时,田氏也强调诗作要有雅正的风格和内容,如引吴国伦之言称颂田九龄诗作“冲融大雅”。他在《〈田氏一家言〉跋》中也明确提出田氏诗风源于诗经、屈骚的风雅传统,所谓“风雅一道……有传书崇山大谷之间,亦有传人,其势恒足以相埒。”田舜年这种主张,是与清初文坛的批评主潮相应和的。自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①,流弊所及,拟古成风。公安、竟陵两派起而反对,又陷入肤浅、冷涩的歧途,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在总结公安、竟陵二派得失的基础上,一方面提出“诗人”即“诗其人”,强调写“真诗”,认为情、志、气萌动而诗生,“如土膏之发,如候虫之鸣”(《题燕市酒人篇》)^②。另一方面又提出尊祖、宗经,要求向《诗经》的兴寄传统和“发乎情,止乎礼义”^③的诗教观回归,强调诗之雅、正。反观田舜年的主张,也是既强调自然抒发,又强调风雅兴寄,与钱氏颇多相合之处,表明田氏的批评思想是与时代同步的。

再次,强调“荒裔文学”(《〈田氏一家言〉跋》)的批评价值。所谓“荒裔文学”,指以容美为代表的远离中原文化圈的边远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的文学。田舜年从情感的共性、民族文学的特性、批评的公正性三个方面分析和强调了“荒裔文学”的批评价值。在情感的共性方面,田氏指出人的基本情感是相通的,并不因地域的悬隔而有分别,“四海九州之大,此心此

① 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48页。

② 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50页。

③ 郑玄笺,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页。

理之同,岂其有畛域限之耶?”因此民族地区的文学同样能引起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广泛情感共鸣,所谓“异地而神交,旷世而相感”(《〈田氏一家言〉跋》),自然也能被不同民族的文学批评家所欣赏。在民族文学的特性方面,田舜年指出“山鸡之羽文彩可观、泽雉之性耿介足垂”(《〈田氏一家言〉跋》)。“山鸡之羽”“泽雉之性”既可理解成文学的外部因素,即民族地区的秀丽山水、淳朴民风及其它们带给民族文学的独特影响;也可理解成文学的内部因素,即以田氏为代表的诗人因民族和地域特殊性,使其作品在题材、辞章、风格等方面具有的特异之美。在批评的公正性方面,田舜年提请人们不要带有色眼镜看待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无过为分别之见焉”(《〈田氏一家言〉跋》)。这实际上是在提醒批评家,只有不抱成见地看待民族文学,才能真正认识其价值。田舜年这一主张,从理论上分析和肯定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批评价值,充分体现出对田氏诗人群体创作成就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这种理论主张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中也殊为少见。

(二)专论和语涉:土家族批评家“论诗诗”批评的两种形态。

关于“论诗诗”的源头,章学诚有言:“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然考之经传……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①此处所引诗句出自《诗·大雅》的《崧高》《烝民》,章氏虽未明言此二诗为“论诗诗”之源头,但从他认为这些是论诗之作,可以推定其当有此意。自《诗经》之后,历代含有论诗内容的诗作层出不穷,尤以咏史、咏人之作中为多,至唐代,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最终确立“论诗诗”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地位。由此可见,广义上的“论诗诗”实包含两种形态:一种是“专论”,即整首都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论诗作、诗人;一种是“语涉”,即语句中有涉及“论诗”内容的诗作。这两种形态都体现在了《一家言》的“论诗诗”当中。

《一家言》的“专论”式论诗诗,多是由论诗而及论人,包含着“文如其人”的理论思想。如田甘霖云“拈来奇伟拟苏黄,落笔风生旧玉堂。往诵文山专节义,今钦鸿宝擅文章。佳怀总结冰霜色,正气遍摅锦绣肠。一字一吟香冷齿,仰看箕尾识光芒”(《读明倪尚书鸿宝集感赋》)。倪鸿宝,即倪元璐(字汝玉,号鸿宝,官至户部尚书),其为人忠直耿介。《明史》本传载:“李自成陷京师,元璐整衣冠拜阙……遂南向坐,取帛自缢而死。”^②田氏在诗中,不仅对倪诗给予高度评价,更对其品行钦慕有加,并将文天祥与之对比,认为二人均德才兼备,品行、文章俱是一流。田甘霖的批评潜含着“文如其人”的理论,即认为其人品行高洁,故其诗亦端直工整。又田九龄《云梦师游自衡岳寄以诸稿奉酬一律》《云梦师寄游太和近作兼附弇州公诸刻》二首,

^①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59页。

^② 张廷玉等撰《明史》,第6841页。

亦将其师孙斯亿(号云梦山人)飘逸灵动的诗风与其人仙风道骨的气质相联系,誉其诗“满贮烟云气”,如“片片彩云飞”,并由此想象其师“遥曳薜萝衣”“朝元跨鹤归”的形象。

另外,还有一些是由论人而及论诗。田九龄云:“锦水烟霞赋兴豪,巫山秋色楚天高。词源泻作东流水,万里风云起壮涛”(《采石怀李白·其六》),田氏依“物感”之说,言李白诗兴皆由壮丽山水激发而起,受其影响,其诗思如东流之水,奔逸不止,其诗风亦宏大壮阔。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物感”说主要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物感人心,形诸舞咏。如《礼记·乐记》云:“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①二是情随景迁,辞以情发。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②由此反观九龄之论,在继承的同时又有创新,即不仅说明景物对于激发灵感的作用,以及对诗人情绪、心境的影响,还特别强调景物对于诗作风格形成的作用。

除了整首的专论外,《一家言》中有些作品的诗句也涉及到文学批评,并可归纳为几类:一是强调文学经世、教化的功能,反对纯为雕饰的淫巧之作。如田玄云:“文能移俗居何陋,经可传人隐亦贤”(《寄怀文铁庵先生》),即将移风易俗作为“为文”的主要功能;“风诗刺巧言,虞典既(按:当为“堊”)谗说”(《又代弋者答》),化用《诗经》与《尚书》的原文及理论主张,批评没有实际内容的艳辞丽语,从反面强调了诗文的经世、讽谏功能。二是认为诗文情感应自然抒发,不必刻意为之。如田甘霖“吾自用吾法,吾以诗自宣”(《复和陶苏饮酒诗·其四》),强调作诗重在抒情,不必依傍诗法、诗格。“诗工穷处已肠宽,饭颗山前带笑看”(《答六十九翁宾虞唐丈》),“穷而后工”是文学批评史中的重要命题,田甘霖却认为不必一味求工,更不应为此使自身穷困潦倒、抑郁失志,并赞誉翁氏能以平常、宽和之心态进行创作。“饭颗”一句,化用李白《戏赠杜甫》诗,强调作诗不必过于推敲琢磨,拘泥诗法,而应以平和、愉悦心态对之。三是提出创作时的一些独特感受。如田甘霖云:“刘郎搁笔诗难就,贾傅追吟赋已遐,到景翻成蜃气远,过情转觉彩丝奢”(《端午诗未成后一日独酌》),以自己创作失败的例子,提出写诗应一鼓作气、不可中断。同时,诗人也感到创作当中,情境往往如蜃气一般,模糊不清、难以捕捉,反而是创作的冲动过后,其情、其境却历历在目、大觉精彩。这实际上涉及对创作心态的讨论,即创作者愈怀功利之心,愈难捕捉灵感,愈怀淡泊之心,愈能发现生活之美。四是对具体诗人、诗作特征的揭示。田甘霖云:“理篋开篇字字珠,读之恐尽意何长”(《余既还司雪斋师亦还公安牛头村以诗别余至兴坪感念难禁取原章和之》),誉雪斋之诗精练工整,含蕴丰富。田九龄云:“至今留得潇湘曲,常使皇英泣紫氛”(《采石怀李白·其三》),以想象之景(李白所作

① 郑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99页。

②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93页。

《潇湘曲》至今仍能引动娥皇、女英思念虞舜的情绪),强调白诗感染力。

汉族批评家的批评方法及特色

《一家言》的批评主体,不仅有土家族自身的批评家,还有文安之、严首升等汉族批评家。中国少数民族文论,尤其是南方少数民族文论,其生成与发展,通过文学交往的方式,受到了汉族士人直接而深刻的影响^①。略去汉族身影的少数民族文论是不完整的,也不符合少数民族文论发展的历史实际。王佑夫提出:“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历程中,汉族学人作出了积极而不可或缺的贡献,他们的著述应被视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组成部分,纳入研究范围之内。”^②可见,汉族对于少数民族作品的批评应纳入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范畴当中。

明末清初,文安之、严首升等汉族士人,为躲避战乱来到容美,依附于田氏家族,田氏对这些汉族士人礼遇有加,并与其多有诗文唱和及诗艺的交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了汉族士人对土家族田氏诗人、诗作的文学批评。这些批评,多采用“序跋”批评和“评点”批评两种方法,以“他者”目光考察田氏诗人的创作,既体现了一定的特色,又对土家族批评家的理论形成了很好的补充,并在诸多方面与其达成共识。

(一)汉族批评家“序跋”批评的两重意义:关注田氏诗人的家族性特征、高度肯定其诗作价值。

汉族批评家对于田氏诗人家族性特征的关注表现为两点,一是赞其诗人之多;二是叹其沿续之久。如文安之《〈秀碧堂诗集〉序》:“况复凤将九子,咸有律吕之和;龙导五驹,各具风云之概”(《〈田氏一家言〉诗评注》),关注到田玄及其诸子形成的家族诗人群体,并赞扬他们各有专擅。严首升在《〈田氏一家言〉叙》中,将田氏诗人群体与史上著名的晋朝王氏家族诗人群体相比较,提出“晋王氏七叶,人人有集”,已颇为不易,但是今“田氏乃更多且久矣”。在赞叹田氏诗人群体之盛的基础上,严氏还分析了其兴盛的原因。他认为内因是田氏诗人“历代沿习、世擅雕龙”,在家族内部很好地营造了文学创作的氛围,并重视传承。外因是明代很多文士都被科举所绊,无力、无暇、无心进行诗歌创作,而田氏诗人则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世袭的土司爵位、或贵族身份,环境、生计、地位皆不成问题,故能潜心创作,所谓“天下作诗者,概为制科干禄,分去大半,而山中人颢志肆力,旬锻月炼,世擅厥美”(《〈田氏一家言〉又叙》)。家族性和群体性可说是田氏诗人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土家族批评家对此较少言及,而汉

^① 笔者认为,明清的边疆政策以及与汉族士大夫的文学交往,共同推动并深刻影响了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形成与发展。参见拙著《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② 王佑夫:《拓展民族文论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族批评家则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多次明确指出这一特征,并做了较为透彻的分析,很好地弥补了土家族批评家的不足。

汉族批评家还高度肯定田氏诗人的创作水平及诗作价值。文安之云:“即使延陵倾耳,必且羨其遗风;倘逢殷璠搜罗,又应目为间气”(《〈秀碧堂诗集〉序》),认为田氏诗作,即便古代著名的批评家吴公子札、殷璠,也必为其所动。严首升《〈田氏一家言〉叙》中既对田氏诗人群的总体成就予以绝高赞誉,所谓“读其诗如探幽选胜,处处移怀而锦绣璀璨,膏馥沾人,受用不尽”。还具体评价了代表性诗人,如认为田九龄的诗作与明代“后七子”的代表人物王世贞、李攀龙的诗作水平不相上下。誉田舜年“诗文又冠古今”。另外,汉族批评家还通过强调田氏诗作的“特色”,以展现其价值,如文安之赞誉田玄诗:“摅义愤于彩笔,已见击碎唾壶;出芳句于锦囊,才闻响绝铜钵”(《〈秀碧堂诗集〉序》),认为田玄诗作饱含兴寄、文质彬彬、敢发异响、突破陈规。严首升认为田圭“其诗蕴藉风流静深而有致,古称辞达,其庶几焉”(《〈田信夫诗集〉序》),明确指出其诗含蓄深沉、简炼自然的特征。汉族批评家对于田氏诗人作品价值的分析和肯定,虽不免有过誉之辞,但大抵而言,较客观地揭示了田氏诗人的特征,也印证了土家族批评家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这种汉族批评家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价值进行理论分析的行为和高度认可的态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显得少见和宝贵。

(二)汉族批评家“评点”批评的三重价值:丰富批评方法、“意象化”批评的特色、褒贬分明的批评原则。

评点体究竟发端于何时,持论不一,但多数认为起源于梁代,如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云:“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钟氏《诗品》、刘氏《文心》。”^①曾国藩在《经史百家简编》“序”中亦持此论,“梁世刘勰、钟嵘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②可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被认为是评点体的滥觞。南宋以降,诗文评点逐步兴盛,并且成为诗文批评的一种重要文体。《一家言》中的汉族批评家使用这种批评文体,填补了空白,丰富了批评方法,同时在“意象化”批评方面体现出一定的特色。所谓“意象化批评”,即用“意象”,而非“理论”解诗。因为评点体篇幅短小,要求评语在三言两语之内,将诗作的核心特色说清楚,运用理论显然很难做到,而使用内涵丰富、具体生动的“意象”,则往往事半功倍。如《诗品》评刘桢诗如“贞骨凌霜,高风跨俗”^③,谢灵运诗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④,都是经典例证。《一家言》中这种批评也较常见,具体可分为两类:

①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② 曾国藩选编,梅季注译《经史百家简编》“序”,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③ 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④ 同上,第91页。

首先是借用经典的诗歌意象进行评点,如严首升评田宗文《九日与虞子墨对酌楚骚馆有赠》道:“如闻岭上哀猿”^①。“岭上哀猿”是非常经典的中国诗歌意象,其源于汉代《巴东三峡歌》。据郭茂倩《乐府诗集》引酈道元《水经注》解其题曰:“至峡口一百许里,山水纡曲,林木高茂。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行者闻之,莫不怀土,故渔者歌云。”^②自此,“岭上哀猿”遂成为包含怀乡、孤寂等内涵的诗歌常用意象,如常建《岭猿》诗云:“相思岭上相思泪,不到三声合断肠”^③,刘长卿《新年作》“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④,皆用此意象表达怀人、思归之义。田宗文生活在容美土司内部争权夺利最激烈时期,可能是有意逃避、亦或受到株连,他离开故乡,出居澧州,虽欲纵情山水、以诗书自娱,然于故乡、亲情终不能全然释怀,其诗亦多怀乡主题,且诗风凄苦、悲凉。严首升用此诗歌意象,形象展现了田宗文诗作旅人思乡的主题,以及孤冷凄清的意境。

其次是借用经典的批评意象进行评点。如果说借用经典诗歌意象进行批评,主要体现了对传统评点批评方法的继承,那么借用经典的批评意象进行评点,则体现了严首升评点的特色。如评田九龄《登五峰怀鹏初兄》道:“蔼蔼春云,态度飘然”^⑤,严氏引用韩愈《醉赠张秘书》“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⑥句评九龄诗风如春日之浮云,飘逸而有高致。韩诗原作中,“蔼蔼春空云”本身就是意象化批评的诗句,被用来形容张氏之诗风格古雅。严首升直接化用此句,而非自造“意象”品评田九龄诗作,且贴切入微,显示了严氏深厚的批评功底。又如评《闻弇州公陟南司马志喜》云:“武库乍开,干戈森然,可以相其严整”^⑦,亦本是批评意象,原出南宋赵与时《宾退录》。《宾退录》卷二引张舜民之语道:“苏子瞻如武库乍开,干戈森然,见之不觉令人神悚。”^⑧本是形容苏轼诗风宏阔、壮大,乍读之下使人不禁慑服。而严首升用以喻田九龄诗格律工稳,是用“陈词”而创新意。又如评《澧上思亲感作》“婉转轻便如流风回雪”^⑨,誉田宗文之诗清新秀逸,亦是直接引用钟嵘评范云之语。

在坚持实事求是、褒贬分明的批评原则方面,汉族与土家族批评家亦达成一致。评点体的一大特征即在“一针见血”地指明诗作优劣所在,《一家言》中的汉族批评家虽多是避难于

① 中共鹤峰县统战部等编《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第 256 页。

②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208 页。

③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 1466 页。

④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 1485 页。

⑤ 中共鹤峰县统战部等编《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第 211 页。

⑥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 3779 页。

⑦ 中共鹤峰县统战部等编《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第 212 页。

⑧ 赵与时撰,傅成校点《宾退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23 页。

⑨ 中共鹤峰县统战部等编《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第 251 页。

容美的汉族士大夫,但是他们在进行批评时,并未因自己寄人篱下的处境而一味曲笔阿谀。如严首升评田玄《军官行》云:“条序井井如奏疏然”^①,点明此作的突出特点在以歌行体写出,而条分缕析、丝毫不乱。又如评田甘霖《松山晚眺》道:“竟是松山图”^②,则强调该作的特点在于形象鲜活。更加可贵的是,对于诗作的不足之处,这些批评家也毫不含糊,如评田九龄《送陈长阳调武昌之崇阳》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③,认为该作未能脱出一般送行诗“恭维”“祝贺”的陈套,缺乏真情实感。在《紫芝亭诗集》最后的总评中,严首升一方面肯定九龄之作,“风骨内含,韵度外朗”,但也指出其诗有“间落时蹊,未去陈言”的毛病^④。又如田圭《饮止止亭观白芍药其种曰杨妃吐舌》,严氏评其“未能免俗”^⑤,指出该诗和多数咏花之作一样,绮艳有余而兴寄不足。评田甘霖《续梦中句》亦有“轻艳”之语^⑥,认为该作流于轻靡华丽。在严氏所批评的这些诗人中,田九龄是田氏诗人群的标志性人物,是让容美土司引以为傲的族中先贤,田圭是他所依附的容美土司田舜年的叔祖,田甘霖更是田舜年的父亲,但是严首升在批评之时,却能准确、客观地指出作品的不足之处,不仅显示了批评的水准,更彰显了批评的道德和勇气。

总体看来,《一家言》中,土家、汉两族批评家采取不同的批评方法阐发的理论观点,既相互补充,又达成诸多共识,同时其具体的理论表述,多有创新之处,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当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南方少数民族文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CZW005)阶段性成果。

(李锋,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吴刚】

① 中共鹤峰县统战部等编《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第136页。

② 同上,第169页。

③ 同上,第231页。

④ 同上,第234页。

⑤ 同上,第272页。

⑥ 同上,第154页。